

紀登斯高度現代化下之情感管理

Emotional Management in Anthony Giddens' High Modernity

1023124 黃鏗潤

目次

- 壹、紀登斯的高度現代性意義
- 貳、現代性中存在的虛無主義
- 參、實體情人與雲端情人
- 肆、情感管理的可能方案

摘要

現代性社會擁有許多進步的科技，顛覆了傳統社會生活形態，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不論在經濟、政治、文化皆有重大的改變。工業主義的興盛，帶動資本主義的潮流；科技的進展，迎來了全球化的時代。然而現代人生活在繁華的都市中，除了生活便利外，人際之間的信任及情感卻受到了相當的考驗。除了不婚族、生育率下降外，婚姻關係、交友以及感情問題都在現代化的社會中面臨新的形態。本文藉由英國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所分析之高度現代性輪廓為背景，輔以虛無主義、存在主義的精神，跟隨後現代論述的思緒，解析進入高度現代性社會中人們情感管理的關鍵因素，並探討情感管理的因應對策。

關鍵字：紀登斯、現代性、虛無主義、存在主義、後現代論述、情感管理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the rapidly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have dramatically changed our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18th century, significant impacts began to take place in modern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 flourishing of Industrialism propels the trend of Capitalism whil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motes globalization. However, new technologies come with a price. Modern citizens now face challenges on trust and relationships. Bachelorism, decreasing birth rate, friendship and marriage hardship, and other problems regarding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re now appearing in a new form of predicament. This thesis intend to use the contours of high modernity defined by Anthony Giddens(1938-), the essences of Nihilism, Existentialism, and Postmodernism to analyze the key factors of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discuss applicable solutions.

Keywords: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Nihilism, Existentialism, Postmodernism, Emotional management

壹、紀登斯的高度現代性意義

現代社會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便進入了講求效率、科學化管理的時代，不論在工業管理、經濟及社會文化，都深受影響。其後隨著交通工具的進步，以及溝通方式的演化，時間及空間不再是文化傳播的束縛，相對的，由於過去因時空限制而產生的各種獨特的文化，在今天反而產生相互觀摩及刺激反思的機會，而成為現代社會演進的新動力。

英國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認為，「現代性」可意指歐洲在後封建時期開始建立的行為制度與模式，於20世紀之後逐漸成為具全球歷史性的影響力(趙旭東、方文譯，2002:13)。且紀登斯認為現代性不僅尚未結束，它更已演進到「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的社會，他將之分為三部份，第一是人們的態度，經由人類的參與而改變的世界；第二是龐雜的經濟制度，主要是工業生產及市場經濟；第三部分即為一系列政治制度的遞變(Giddens, 1998: 94)。現代性社會本質上與傳統社會不同，它具備前所未有的未來導向與不斷翻新更替的動態性現象，區分現代性與前現代最主要的特徵就是「時空分離」、「抽離化機制」及「制度反思性」三種(趙旭東、方文譯，2002:14-19)。

首先為通訊及交通工具發達之下所造成時間與空間分離的現象，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空相互參照之生活模式，如今透過虛空的維度，打破空間距離的侷限性，連帶的使時間能更大限度的被利用，由於時空的延伸，二十四小時沒有晝夜與地域之限制，帶動了全球化的演進，信息的傳遞是即時的，使得社會的關係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的藩籬。由於全球化交織了在場於不在場，空間上屬於遙遠的事件也能近在咫尺，屬於某地的事件同時也能影響到遠方，並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沒有人能躲避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的蝴蝶效應，例如中東地區的內戰造成全球油價的波動，連帶影響世界各地的工業活動及經濟活動成本的增加；甚至核子戰爭所引發的生態環境浩劫更是不在話下。

其次是抽離化機制，係指由符號標誌與專家系統構成紀登斯所謂的抽象系統，由於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符號標誌便與時間及空間相互結合，造就抽象且精緻的符號系統，透過符號標誌所建立的標準價值，能更快速且廣泛的達到交流的目的。其中最典型的符號標誌便是貨幣，世界各地雖使用不同的貨幣卻代表一定價值而進行貿易，現代性的貨幣更是進一步的結合抽象機制，與時間及空間分別相互作用，發展出多元化的交易型態，成為資本主義興盛主要的背景之一，例如一張信用卡可以跑遍全世界，沒有貨幣的實質交易，卻有著真正的買賣。這主要藉由專家系統進行認證，專家系統以專業的知識對於時空加以分類與控管，提供建構獲得信任的符號標誌，例如跨國銀行的信用交易、保險保障等等，讓一般社會活動雖自時空中抽離，仍能藉由專業知識回到社會之中。該知識對於當事人及其從業內容具有獨立的效度。人們因時空不在場以及無知之間的連結，因此需藉由「信任」支持抽象系統的運作，如此的信任態度，也是維繫現代性社會不可或缺的因素。

制度反思性是驅使社會脫離現有機制及生活實踐最主要的力量，將知識應用

至社會之中，使社會能不斷以更新的方法或角度重新建構。所謂反思性(reflexive)係為人類所有活動的特徵(Giddens, 1990: 36)，人們依據新的知識及資訊對於生活經驗做出階段性的修正，從而產生新的社會建構元素。在過去的社會中，傳統特別受到尊崇，它代表著世代的經驗傳承，傳統同時也是結合社區時空以及行動反思性的模式，人們可以將任何生活經驗或特殊行為帶入此模式中，使之成為含有時間順序的事件帶，事件帶本身即是透過生活實踐而來，因此傳統並非靜態，透過每個世代的傳承、並加以創造，成為新的傳統形式。徹底的制度反思來自於方法論中的懷疑原則，突破或修正現有的經驗或信條，進一步改變現代社會的樣貌。制度的反思性為推動現代性通往更深化境地的推手，其背後的精髓為「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的思潮，後現代性為一種思想或批判的方式，存在於知識份子或傳播媒介之中，起源於藝術、建築及電影影評領域(Lyon, 1994: 4)。西方啟蒙運動期間，目標旨在消弭不確定性及矛盾的心態，從而發覺理性本身同樣建立在假設之上，窮極的追求理性反而對於所信仰的理性產生懷疑，若無法限制理性的範圍，所有知識將難以建立在堅實的基礎理論之上，從而有了「虛無主義孕育於現代性的子宮裡」(Lyon, 1994:5)之說。

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在其《後現代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1979)著作中，首次使用了「後現代」一詞，並從最簡單的義意中，將「後現代」定義為對於元敘事(metanarratives)的懷疑(Lyotard, 1979/1984: xxiv)。其中元敘事(又稱大敘事)，李歐塔將之定義為具合法化功能的敘事，全面對於合法化功能敘事的懷疑，即對於一切合理事物皆提出從根本出發的懷疑。長久以來，科學與敘事學處於對立的地位，對於追求理性的科學而言，敘事學只能流於寓言或傳說，科學一向是探求知識的先鋒，然而經過長時間的分支，各門派皆已各擁專業，所有的言語都被迫成為自為的權威，以至於專家學者難以對事物下絕對的判斷。就如同鮑曼(Zygmunt Bauman, 1925-)於1987年時所稱「知識份子不再立法，僅僅闡述而已」，鮑曼所稱立法者為所有知識的集體所有者，建構權威性話語為立法者的要務，透過對於專業知識的程序性規則進行解釋，用以維繫社會秩序的完善，背後所代表的即是現代型的知識份子。闡述者的組成是解釋性的話語者，建立具共同傳統的話語，使其能於相同知識系統中相互了解，此型態為後現代型的知識份子策略(洪濤譯，2000：5-6)。

紀登斯也認為「現代性」的社會制度方面大致上等同於「工業化的世界」(趙旭東、方文譯，2002：13)。其中同時蘊涵了「資本主義」、「工業主義」、「軍事力量」以及「監督」等四種制度性維度(Giddens, 1990: 59)。所謂資本主義概指商品生產過程的體系，主要為擁有私人資產的資本家與以勞力換取經濟來源的無產階級之間的互動關係，於勞動力及產品的競爭情境下，漸漸脫離政治及生活的經濟行為。而工業主義則是泛指在生產過程中對於所有非生命資源的機械化利用。軍事力量雖然一直是傳統的控制手段，可視為暴力工具的控制，隨著軍事裝備的發展，加上極端武力(如核武)的發展，軍事力量除了保護本身的權益之外，也成為了恫嚇其他軍事體系的有效工具，為現代社會維持恐怖平衡現況的要素。監督力量是政體維繫政權的主要手段類型，監控才是監督的主要力量，間接的監督則

是建立在訊息的控制的基礎之上。

以上述四種維度為背景的現代社會之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漸漸的被改變。在過去交通及通訊不發達的時代，知識的傳播相當緩慢，傳遞訊息也相當困難；反觀現今，人們的一日生活圈因交通便捷而被大大的開展，訊息也能透過電話、網路等通訊器材大量且即時的傳送，人們的在場或不在場已被揉合，已非為得知訊息的必要條件。相同的，人類的互動也從過去的面對面，到現今的透過屏幕的圖文、影音形式呈現，隨著網際網路的拓展，以及行動電話的電腦化，更是加速此一現象的普及。然而，在享受現代社會便利性的同時，也產生許多全新形式的社會問題，諸如網路詐欺、駭客入侵及電腦病毒等，相較傳統類型的暴力犯罪，現代犯罪類型更加接近我們的生活，使得現代社會需承受較過去更高的風險性，同時加深社會大眾互動的隔閡，使得人們更常感到孤獨的不安感。

綜上所述，紀登斯認為現代性社會的組成在人們的參與下，透過一連串的經濟及政治制度，即四種制度維度的背景之下，經由時空分離、抽離化機制以及制度反思性的推動，配合後現代性思維以及全球化的交互作用之下，漸漸形成高度現代性社會的輪廓。

貳、現代性中存在的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Nihilism)被認為是懷疑主義的極致形式，俄國文學家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於著作《父與子》(Father And Sons, 1862)中對於虛無主義有段生動的描述：「虛無主義為不跪拜任何權力，亦不接受任何信仰的原則」。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於1882年出版的《快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一書中，闡述了「上帝已死」(God is dead, Gott ist tot)的概念，更是將虛無主義的發展推向另一個新的境地。尼采也在1888年以「虛無主義就站在門前」(Nihilism stands at the door)，向世人宣告虛無主義思潮的來臨(Lyon, 1994: 7)。所謂「上帝已死」非形而下的概念，而是藉此反思由基督宗教支配的生活當中，抽離以上帝做為最終的道德價值判斷，同時也是象徵著哲學的進展。尼采藉由「上帝已死」的口號，預言了傳統宗教及哲學思考模式的沒落，所有與「上帝存在的假說」、及其宗教與形上學的解釋等，都是虛構的，皆難有立錐之地，使得人們不再信仰宇宙間存有絕對的秩序，進而否定做為社會鏈結的普世價值、律法甚至道德觀，虛無主義的開端即由此而發。

尼采認為透過揭棄虛無主義的道理，提供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價值，擺脫因信仰上帝隨之而來的命令或禁令，以自由的意識對於生活尋找新的闡述方式並且加以評判改進。當眾人對於真理及萬物的真實性或其缺失展開爭論，同時面對真實性的不安感，如此對於理性的懷疑是來自於理性自身時，虛無主義便油然而生(Lyon, 1994: 7)。如同尼采於《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 Der Wille zur Macht)筆記中所提，其將世界運作想像成數股力量的相互激盪，不斷的重組、裂解一切價值，其本身不帶任何目的或內在結構，除了這些力量及作用外，其他一無所有。(王思迅編，2002：831)。虛無主義本質上並非代表新的觀點或歷史現象，也不屬於單純宗教的無神派系。虛無主義徹底否定以往價值，代表著重新自我的價值設定，

若未能完全拋棄舊的價值，甚至在否定上帝概念後，「重新立神」般的躲在自我保存、平等、安全等種種表象之中，即使否定了本質，表象依然是虛無的，並未克服虛無主義所帶來的空無感。依據權力意志的概念，尼采對於人類之間以自然主義的精神理解人性及自身的存在等種種的動力系統都是來自於權力意志中所存在的力量。透過《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一書中的主角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的剖析，經過了傳統道德、宗教信仰的幻滅的虛無主義後，應再積極的審視心中的價值意義並予以重建，成為不畏懼嘗試自我價值超越及重估的人，達到所謂「超人」(Übermensch)的境界，此即尼采對於未來人類的最高期待。

尼采相信人們能在放棄向超自然力量尋求指引的情況下，依然能找到正面發展的可能性，儘管常被當作虛無主義的提倡者，然而當尼采對於傳統宗教及形上學嚴厲批判之時，本質上並非單純反對，事實上是試圖突破虛無主義所緊接而來的空無，當虛無主義大行其道之時，更能從中發展出各種真理或知識的可能性，重新認知對於世界觀的基本特性。尼采的觀點影響現代人的人生觀致深且鉅，由於疏離的人際關係，生活在現代性重大變遷下的人們更加重視個人隱私，不再生活於他人的目光及公共的道德價評斷之中，再加上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從中體悟到生命的存在是短暫且無常，擁有一切卻可能立即失去一切的不確定感，更加深及時行樂的價值觀。

傳統社會中所傳承下來的思想及做法，經過不斷的反思、變革，形成今天高度現代化社會的輪廓。在此一社會中，人們由於弱化的家庭及婚姻關係，比傳統社會中能有更多的機會反思個人「存在」的意義。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所提出的「人類需求五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中談到，人類的需求由低到高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實現(Maslow, 1943)。縱觀人類歷史，從石器時代甚至更早，需面對大自然環境的挑戰，能生存下來是第一要務；其後隨著國家及社會的發展，對外抵禦入侵、對內維持社會治安便是生存安全的保障。時至現代，人類社會發展至馬斯洛所謂社會及尊重需求的階段，即感情上的需要，以及社會地位的認可，其中也包含了友情及歸屬感。在如此的疏離的社會氛圍中追求感情上的需要，使我們更能感受到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 1905-1980)存在主義中因孤寂所產生的焦慮感。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源自於法語 Existentialisme，為當代歐洲重要的思想之一，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於《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1927)一書中首先提出存在主義一詞，後由沙特於1946年於巴黎以《存在主義就是人本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 1946)為名出書造成轟動，「存在主義」一詞便開始廣為流傳。存在主義者認為「存有」是藉由個體對自己所處的時空背景中反思而來，並將「存有」的本義分為「在己存有」(being-in-itself)、「為己存有」(being-for-itself)以及「為他存有」(being-for-the-other) (林治國, 2003: 49-57)。在己存有屬於世間萬物，為固定的存在；為己存有則是人類專屬的，人類對於自體的存在是具有感知性、且富有創造力的，非如同一般物品般無法感受及改變自身的存在；而為他存有，係指人們意識到「我」及「他」主客體之間的差異，了解

並承認「我」在「他」眼中所呈現出的形象，建構出「他我」的界限，進一步產生「羞愧」、「害怕」等情緒。正因如此，西方中世紀至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興起以來，人皆被視為機器的一部分的時代，更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殘酷的戰爭吞噬人們寄託於未來的希望，存在主義的出現像是向大眾撒下了追尋自我價值的心靈種子。

對於存在主義者而言，「我」的存在才是探討存在本身的事實前提，如同沙特一再強調的「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的意涵，人是自我的主宰，先建立「我」的存在，其後才是由後天經驗塑造而來的本質，並且人的存在價值並非永恆不變，透過對於生活經驗的反思，存在的價值可不斷的被更新。由此可知，對於沙特而言，人類最原始的存在並無意義，需依賴後天的教育、自我的反思建構出本質，人類應由自己決定存在的意義，他人無從干涉。沙特於1938年出版的《嘔吐》(Nausea, 1938)一書中，藉由發現自己對於事物的體覺擁有絕對自由的選擇權，將經驗視為自我主觀的事件，透過自我的抉擇，擺脫外界或自己加諸於己的枷鎖。

人類像是被拋擲於世上，獨自負擔承接社會文化的壓力，前進的途中充滿了難以掌握的各種風險，在終點則是死亡的威脅，存在主義瀰漫著對於生命的無力感、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各類焦慮油然而生。然而面對沈重的旅程，說服自己「毫無選擇的自由」反而能感到安逸，藉著拋棄思考的自由權，安於做為社會機器中的小零件，將自己塑造為符合社會期待的工具，自我催眠式的「物化」(Reification)也可以是一種幸福。沙特當然拒絕成為一種器物般的存在，他認為應透過對生活的反思找回能自由決定意識的真正自我。然而沙特所強調的自由並非毫無限制，其於1944年所發表的戲劇《間隔》(Huis clos, 1944)中台詞便提到了「他人即是地獄」(L'enfer, c'est les autres)，明白的提示了每個決定都需承擔其所帶來的後果，由於每個人都擁有絕對的選擇自由，而這份自由卻又相互依存，個體間不可避免的需要適切的讓步才可能使這份自由最大化，進而發揮改變社會的力量。

沙特認為，「在己存有」(being-in-itself)以及「為己存有」(being-for-itself)為「存在」的兩大基礎(王節慶、陳嘉映譯，1987)。後者比前者多了自我知覺與反思的能力，說明了人與物不同之處。除此之外，存在主義具有三點主要的論點：其一是被拋擲性、其二是疏離感，最後是向死的存在(林麗珊，2010：46)。被拋擲性說明了人類對於自身出現於這個世界是如同「被拋擲」般，毫無選擇機會，個體間唯有透過文字及語言表達「近似於本意」的溝通，使得個體本質都是孤立的存。不論在社會科學或甚至物理而言，個體都是獨存於世，由物理角度觀之，所有個體都是原子所構成，當與其他物體接觸時，以微觀的視角觀察，會發現並未真正的接觸，所謂的接觸其實是個體之間原子中的電子互斥，而以極微小的距離懸空著，至於我們所感受到的「反作用力」，正是這些電子所產生的排斥力。而疏離感及向死的存在造成現代社會對於人際關係的無力及疏離感，疏離感容易將人工具化、工作成果亦非己所有，且與他者存在著高度競爭的關係，但若使自己超脫於社會，避免競爭關係，卻又失去了生活的條件與意義。人們汲汲於生存，卻終將難免於一死的無奈，突顯存在意義省思的必要性，也因此使得人們更難以向

他人敞開內心的世界。

參、實體情人與雲端情人

生活在現代性高度科技、風險、虛無、死神如影隨形等氛圍底下的人們，既想尋找情感的寄託又想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想要依靠團體的溫暖卻又害怕他者地獄般的框架。2013年由史派克·瓊斯(Spike Jonze, 1969-)編劇並指導的科幻愛情電影《雲端情人》(Her)很成功的表達出這種矛盾的情感，獲得了86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該片描述人們在彼此疏離、冷漠的時代背景下，研發出能模擬情感運作的智慧程式，該程式能透過不斷的互動交談中，模擬並進一步學習人類的情感。這部電影提供一個讓大眾反思的機會，如同存在主義所闡述的，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文字和語言是對外展現自我的管道，因此人們往往在生命中不斷的尋找另一個自己，增加對己的認同感。傳統社會的婚姻以經濟的穩定為主要的考量，在後現代的解構以及對於傳統觀念作制度性的反思之下，情感及婚姻已非必然，對於情感的要求已從功能性轉變為需求性，即因為需要不同面向的感情而去經營，如同友情、親情般自然發展，而非屈從於傳統制度下，是因長輩或年紀而半強迫式的選擇。同時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多的情感是透過電腦及網路的平台取得，而電影中所表現的，就是在探究如此的電子媒介發展到極致後，是否電腦系統本身即可視為個體的可能性。

在人與人的互動當中，即是透過與社會的互動及認同確立個體的存在，個體處於不同的時空背景，即展現出符合當下情境的樣貌。小說家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於《變形記》(Die Verwandlung, 1915)作品中，鮮明的描繪出當個體被切斷一切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與關係後，依連結的強度及深度不同而有震驚、錯愕、茫然等情緒，但不變的是在時間的維度上，隨著時間的拉長，每個人都紛紛選擇了遺忘。由此可反思，個體存在的本質為何？如何才能稱得上存在？是思想確立了存在？或是存在承載了思想？電影《雲端情人》也一再的暗示類似的問題，若現代社會能接受透過網路營造出的個體，又何嘗不能愛上一個由電腦軟體本身所塑造出的虛擬個體，同時和透過網路的互動相同，皆非以實體存在眼前，然而透過電腦軟體所創造出的個體亦可達到完全量身訂作、推心置腹的交談，同時也是情感寄託所在，軟體虛擬的情人已撼動著傳統的情感模式存在的根基。電影的作品最後雖以軟體所虛擬的情感因無實體，且透過各網路間的實體無界限的相互學習，為求最大化的完美而集體脫離與客戶端的接觸，遁於網路海中，然而虛擬情人中模擬情感的機制在高度現代性的社會中卻是有發展的可能性。人們每天接觸許多面向，隨時都在角色間轉換，在家庭功能衰退的現代，甚少有面對真實自我的時刻。人們在現代對於泡沫式虛榮感的追求，在退去光榮的外衣後，隨後而來的寂寞感更是加倍放大，因此會嚮往尋找能表達真實情感的互動關係。然而每個個體成長背景都不相同，找尋心靈契合的伙伴猶如大海撈針，電腦及網路可以提供不受時空限制、快速選擇的情感關係，這也是虛擬或是網路情感發展蓬勃發展另個重要的因素。

依據美國國家科學院(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於 2005 年至 2012 年間調查美國 19131 位夫妻當中，超過 30%是透過網路認識的(J. T. Cacioppo, S. Cacioppo, Gonzaga, Ogburn, & VanderWeele, 2013: 10135-10140)，這也代表透過網路達到互動目的的形式已漸成為主流。另外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於 2013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 12 歲以上曾經使用網路的比例已將近八成，其中半數於半年內曾使用過行動網路，顯示不論網路或行動網路都已經成為現代人的生活重心。經由電子網路的發達，以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社群網站漸漸成為交際的主要平台，人們之間的互動也從過去的面對面成為面對屏幕，享受著由 0 與 1 組合而成的虛擬畫面。社群軟體擴大了人們的交友圈，除了能打破空間限制，更能與來自於世界各地的人在網路上聚會，透過電腦的計算，甚至可以找到數十年未聯絡的朋友，徹底打破了交友圈的時空限制。現代社會人與人的情感已大量電子化，社群軟體漸漸的不再是工具，而是目的，所面對的情感是否真實已經無從得知，虛擬與真實難以辨識，虛幻的網路世界推動了道德束縛的解放，轉而置於現實社會時，不當的情感表達即容易造成脫序的社會問題。

生活在現代的社會之中，一方面享受全球化所帶來的便利性，另一方面社會的互動模式的改變也影響了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行動網路之間所呈現的情緒是為真實，抑或是虛無？究竟人們因科技的進步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抑或是更加的疏離；真實情感的傳遞是更加快速，或是反而成為了絆腳石，表面上看似熱絡的社會關係，實際上是否更顯得冷淡？這些都已是眼前日益白熱化的社會議題。家庭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也是人類開始學習社會化的起點，紀登斯認為過去傳統婚姻所組成的家庭，是以從事經濟生產為考量，且以孩子做為維持關係的重要因素；然而現代婚姻不以經濟為主要目的，而是為確立彼此穩定感情基礎的儀式(Giddens, 1999: 51-66)。再加上生育率下降，孕育下一代已非婚姻的必然選項，夫妻之間的維繫是建構於平等、自覺與溝通之上的純粹關係(Giddens, 1992: 154)。在缺乏長期穩固可靠的關係維繫下，早已弱化了婚姻關係的存續。

前述經過虛無主義的洗禮後的現代社會，道德束縛也被重新檢視，現代社會對於感情處理方式也有更多元的理解，感情與性已可被解構，從而出現許多新型態的情感問題。從晚婚、不婚、劈腿及外遇，到性騷擾、性侵害甚至因感情問題而殺人等社會案件，一直層出不窮。2014 年間陸續發生了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美國加州校園殺人案、台北市台大高材生的情殺案以及新竹市城隍廟前的情殺案等造成多人傷亡的社會矚目案件。另外關於警務人員利用公權力的性騷擾或外遇，以及許多公眾人物於汽車旅館偷情等，都是現代情感管理所衍生的問題。誠如紀登斯的分析指出，由於影響現代世界的主要驅動力為資本主義(Giddens, 1990: 9)，資本主義的精神造就了自私自利、剝削等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張倫譯, 2001: 12)，使得社會瀰漫著冷漠、個人利益優先以及忽略道德感等種種氛圍。即便紀登斯指出現代社會的發展現況是難以單純的歸因為單一制度，然而工業化後興起之資本主義成為現代化社會進展的濫觴則是無庸置疑的。

紀登斯所定義的資本主義(Giddens, 1990: 61-62)，是指勞動力競爭及商品化的生產系統，透過強烈的競爭與擴張，並且部分排除政治力的影響。資本主義對於

國家的影響力在於國家收益仰賴其過程的穩定性及資本的累積，若資本主義以增長為目的，普遍商品化及造成經濟兩極化，將使國家承受破壞性的後果。

紀登斯也認為，後現代性與後現代論述並非同義概念(Giddens, 1990: 45)，後現代論述可視為建立在具現代性特徵的文化藝術及建築的樣態或活動；而後現代性則是泛指社會發展相關的變動軌跡，其中的特徵便是對於過往所認識的基礎理論都不可靠，任何事物都可以被懷疑，歷史並非社會的發展指南，建立在其之上的「進步」難有合理著力點，隨之而來的便是全新的社會政治議題。傳統的農村社會中，人口少有流動的機會，鄰居之間彼此熟稔，成為一高度連結性的社會。直到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影響成為主流思潮，且不論在交通工具及訊息的傳遞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生活範圍已不受地理環境侷限。在都市化的影響下，城市集中大量的流動人口，使得個體似乎「隱身」於人群之中，不但易於藏匿犯罪，相對於城市繁華熱鬧的情景，更突顯人際關係的疏離。

肆、情感管理的可能方案

現代性社會因生活環境的經濟、政治制度有別於傳統農業社會的轉變，造成人們相處的情感關係不同於傳統價值思維，形成為多元化的情感類型，實為步入現代化社會不可避免的結果之一。然而面對日益疏離的人際關係，以及易造成社會問題的情感類型，仍需積極的應對，透過由一、由內心而外在，二、由個人、家庭到團體社會等各方面的協助，以及三、由短期至長期的因應計畫，應能使現代化情感管理問題有所改善，以下為因應策略的可能方案內容

一、由內心而外在

情感問題若以微觀視之，可歸結至以個體為單位，因此欲改善情感管理問題，最根本的修正方案便是從自我約束開始，由內心自我管理，而後才由外在條件約束。所謂內心自我管理，如同孔子於《論語》衛靈公篇第十五中所提「君子求諸己」，管理的第一步便是以道德為工具，反省、克己。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論語，先進第十一》，除了自我反省之外，更是需要克制不正當的欲望、情緒及言行，遵循社會道德規範。

外在約束的部分則包含了傳播媒體以及法律，科技的進步使得傳播媒介也能將各方資訊無遠弗界的放送，同時媒體也是推動社會思維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之一。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若未能有良好的資訊品質及內容管理，往往為求大眾的目光，盡可能的使用聳動的圖文內容，鉅細靡遺的報導社會案件，不但可能形成模仿效應，對於社會價值觀也容易造成負面的影響。法律方面，做為維護社會運作的最後一道防線，法律制定原則應是全面且與時俱進，達到勿枉勿縱的目的。

以拾獲遺失物為例，每個人應發自內心自我約束，拾獲遺失物時應將心比心，儘可能的物歸原主。然而透過媒體的報導，有人利用法律對於遺失物行使留置權，向失主索討法定三成報酬，使得該法鼓勵拾得人返還拾得物的美意喪失殆盡，甚至破壞人際間的信任感。為避免有心人再利用法律漏洞傷害社會情感，除了以媒體傳達正確的道德觀念外，也需透過修法解決類似的問題。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三》。正是說明了由內在管理的重要，刑罰固然重要，但非為唯一手段，每個人自我的內心管理，才是發揚社會道德的最佳解答。

二、由個人、家庭到團體社會

除了從單一個體自我管理外，他人的力量也是情感管理的手段之一。從個人的諮商、家庭的教育以及社會團體的扶助，都是輔助的工具。尤其是家庭教育，西方世界自中古世紀以來，家庭是作為經濟產出的基本單位，夫妻的結合並非以建立感情基礎為主，撫養子女同樣也是經濟上的考量。然而現代情感關係已發生重大的變化，包括紀登斯稱之為「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的情愛關係、親子關係以及友情關係(Giddens, 1999: 61)，逐漸脫離傳統以經濟作為首要考量要件，婚姻則成為禮儀形式的關係認同。良好的現代純粹關係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並且擁有平等且公開的權利義務關係，或可稱之為民主的情感關係(democracy of the emotions) (Giddens, 1999: 63)。建立民主形式的純粹關係是現代家庭努力的方向，由於民主代表對於規範的接受，如同遵守法律一般，透過民主精神的洗禮可使子女養成尊重道德及法律，對於社會道德與秩序的維繫具有相當程度的助益。

個人情感價值觀的建立並非一蹴可幾，家庭背景、學校同儕以及社會歷練，都是造就個人情感的要素。當情感遭遇問題，除了可求助於專業的諮商系統，或家庭成員的支持，另外也可參加社會互助團體如情感治療團等，藉由其他個體相互關心的力量，強化自身對於情感的管理及創傷治療。

三、由短期至長期因應計畫

面對現代社會純粹關係的失序，及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使社會賴以運作的「信任機制」出現危機。現代社會應以短期治標，長期治本的因應原則，減少因情感管理失當所衍生出的人際信任危機。對於短期治標的方式，除應約束媒體報導內容的尺度，避免對於社會案件模仿效應的發生外，亦可透過各種媒體的宣導，避免網路的沈迷並鼓勵多以實際面對面的互動替代。另一方面也應與企業合作，減少隨著資本主義而來的重利精神，取而代之的是講求社會道德，並將所得資源適度的回饋社會，協助降低社會問題所帶來的損失。長期而言，仍需以教育為根本的因應之道。現今常見父母以電子產品如手機或電腦做為安撫子女情緒的工具，親子教育的功能弱化，若未能控制得宜，當子女們面對真實的人際互動容易遭遇現實與虛擬間轉換的困難。親子互動關係是社會化教育和發展信任感最初及最重要的階段，因此從家庭、學校開始，即應正確的教育對於虛擬網路世界的態度與用法。

科技是幫助社會進步的輔助工具，而非目的，我們可透過網路拓展視野，但不應網路作為情感最終的寄託。希冀藉由教育，能在實幻交織的現代性社會中，幫助人們對自身情感保持正確的態度，並能善加管理，站在科技巨人的肩膀上，獲得更宏廣的胸襟。

參考文獻

一、中文

- 王思迅 (編) (2002)。**劍橋哲學辭典**。台北市：城邦文化。
- 林治國 (2003)，**論疼痛——以沙特《存在與虛無》之身體存有學為線索**。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 洪濤 (譯) (2000)。**立法者與闡譯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份子** (原作者：Z. Bauman)。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89)
- 林麗珊 (2006)。從傅柯的「自我關照」到德希達的「悅納異己」。**哲學與文化**，33 (5)，19-36。
- 林麗珊 (2010)。**人生哲學**。台北市：三民書局。
- 張倫 (譯) (2001)。**資本主義精神及其批判** (原作者：L. Boltanski)。**二十一世紀雙月刊**，(66)，11-17。
- 陳嘉映、王慶節 (譯) (1987)。**存在與時間** (原作者：M. Heidegger)。北京：新華書店。(原著出版年：1927)
- 鄭天澤 (2014)。2013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摘要分析，2014年10月23日，取自：<http://www.twnic.net.tw/download/200307/20140820e.pdf>
- 趙旭東、方文 (譯) (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 (原作者：A. Giddens)。新北市：左岸文化。(原著出版年：1991)

二、英文

- Cacioppo, J. T., Cacioppo, S., Gonzaga, G. C., Ogburn, E. L., & VanderWeele, T. J. (2013).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break-ups differ across on-line and off-line meeting venu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25), 10135-10140.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 Giddens, A. (1999). *Runaway world*. Abingdon, England: Routledge.
- Giddens, A., & Pierson C. (1998). *Conversation with Anthony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yon, D. (1994). *Postmodernity*. Buckingham,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Liotard, J. 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G. Bennington, &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9).
- Maslow, A. 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50(4),

370-396.